避免下一场冷战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概述了笔者在冷战起源方面的重大发现，阐明了为何不能以类比冷战来框定当代中美关系，并强调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关键，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成功的国内政策。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 中美关系 冷战 美国国家安全

1992年，我出版了《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书。我很高兴该书后来赢得了诸多图书大奖，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班克罗夫特奖”，它是为美国历史和传记类图书而设立的最佳图书奖。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该书的内容依然被视为对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实际上，在2017年举办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一些著名学者重新审视了该书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开放了很多新的档案，也出现了许多国际史撰写方法上的创新，但是《权力优势》一书依然对冷战爆发的原因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在这篇新的“中文版序”中，我将突出强调那些我认为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不仅如此，我还要反思这些主题与当代国际事务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二战后的美国决策者们制订了一项遏制苏联力量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大战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资本主义传播的世界秩序。这些人深受如下历史教训的影响：一是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二是法

梅尔文·P. 莱弗勒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为《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的前言，题目为作者拟定。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授权许可，并进行了少量文字修改。

美国的决策者们
在二战结束时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需求有了一个非常具有扩张性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对于冷战的起源贡献极大。

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产生；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与军事动机。美国政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需要海外基地，以便组织美国的纵深防御并投放美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绝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敌国或者任何一个敌对联盟在欧洲和亚洲获得权力优势。逐渐地，他们开始相信美国自己也必须要保持在全球竞技场上的权力优势，以便捍卫美国在海外至关重要的利益和国内的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决策者在二战结束时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需求有了一个非常具有扩张性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对冷战的起源贡献极大。

我之所以会得出这些结论，是因为我对军事、情报和国防档案进行了大量新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解密了一大批军事档案，其中包括许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项目。我不仅检视了美国陆军和海军官员们撰写的文件，而且还研究了新成立的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文献。同样，我还分析了中央情报局早期撰写的许多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就存放在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我也利用外交史学家查阅国务院档案的惯常工作补充了这项研究。

本书中特别新颖和原创性的内容就是将地缘政治、政治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方法。我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官员相信国外地缘政治的力量格局将会严重影响在国内维护自由政治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鉴于1939—1942年的经验教训，美国决策者们认为当对手控制了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时候，他们就会试图对美国发起攻击，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对美国发动一场持久战。华府官员们认识到，如果对手们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将使他们获得在拉美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些决策者们担心，如果敌国——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控制了大部分欧洲和亚洲，那么美国就可能不得不变成一个“军事管制国家”（garrison state），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会对个人自由、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有害无益。届时，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将会面临重大威胁。他们认为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但是，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并不预期苏联人会发动一场有预谋的军事侵略战争。基于大量新的档案证据，我非常认真地检视了他们的威胁认知问题。在冷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里，华府决策者们并不认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发动一场无缘无故的攻击行动，他们知道他并不拥有直接轰炸美国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担心苏联会利用西欧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局面，利用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德国西部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意志消沉情绪，利用部分亚洲和非洲地区的革命民族主义热情。他们相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以及种族灭绝和殖民统治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会对欧洲和亚洲那些精疲力竭和意志消沉的人们产生吸引力。他们担心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将逐渐被吸引到苏联阵

营中去,不是由于武装侵略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以下事件带来的结果:共产主义在诸如法国、意大利和中国等地取得胜利,美国对德和对日占领政策失败,以及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北非和其他地区的革命民族主义热情增长。

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以及意识到自己手中握有优势力量(基于经济能力、战略空中力量与核垄断三大因素),美国政府的官员们确信他们不仅可以冒险支撑那些被感知到的安全短板,而且还可以冒险挫败莫斯科利用战后有利形势的任何计划。美国政府的官员们知道“马歇尔计划”、德国西部占领区重建与统一,以及在日本实施的“反向”(reverse course)政策都将被视为对莫斯科的威胁,但是华府的决策者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这些举措。他们把上述国家看得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潜在的工业和经济能力。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属于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苏联人可能会做出消极反应,但他们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优势力量。中国在当时并不被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它被视为一个贫穷、落后且无可挽回地陷入内部冲突之中的国家。当时,是恐惧激发美国在优先考虑的重要地区采取冒险行动,而力量又使得美国的冒险成为可能。因此,恐惧、力量和战略是《权力优势》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

此外,我还说明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需求是如何塑造军事义务的。当时,华府官员们下定决心一定要重建和笼络德国与日本。但是他们也承认这样做会在整个西欧和亚洲引起巨大恐慌。为了缓解这些恐惧心理,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不情愿地承担起了保卫潜在伙伴国和友好国的义务。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以及北约组织的成立不仅仅是用来承诺保护缔约国未来不受苏联侵犯。实际上,这些军事承诺——以及对菲律宾、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做出的其他军事保证——都是为了缓解巴黎、伦敦和其他国家的恐惧心理而采取的举措,因为这些国家都在担心一个恢复元气和东山再起的德国或者日本可能会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尽管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为什么要把德国、西欧以及日本看得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冷战会扩散到印度支那地区、朝鲜半岛、伊朗、中东以及其他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在这里,我再一次阐释了华府的战略思维是如何塑造冷战发展的演变进程的。1947—1950年,让美国的决策者们越来越深信不疑的是,他们重建和笼络西欧、德国和日本的努力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对第三世界外围地区市场和原材料的保护。日本需要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出售它的工业制成品以换取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西欧也需要伊朗和中东的石油。根据华府战略家们的说法,如果第三世界外围地区逐步被吸引到苏联或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范围之内,那么欧洲和亚洲的工业核心地区就不能永久性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了。

尽管把地缘政治、威胁认知、政治经济融为一体是《权力优势》的主题,但是本书还阐释了战略与预算制订之间的交集问题。美国政府官员们的地缘政治

思维使得他们对美国的预算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像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er）这样的国防官员们相信美国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能力所及，并且他想获得更多资金分配给各大军种。然而杜鲁门总统却认为国内的优先事项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在本书中，我阐述了战略如何使令决策者极为痛苦的关于优先事项的预算抉择成为必要。只有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才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要求的大幅增长的军事开支。该文件是在整个冷战时期所有国家战略文件中最为著名的。在发生这一变化之后，我开始阐释美国政策在1950—1953年之间是如何从防御性的追求权力优势的战略转变为进攻性的和霸权式的追求权力优势的战略。

当撰写本书时，我在得出结论方面殚精竭虑。我对冷战形成时期整个美国的冷战战略提出了一项有质感的评估。我既没有对美国的冷战战略进行过分赞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味批评，而是对它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评价。我强调，美国的冷战政策部分是明智的，部分是愚蠢的，但大部分都是谨慎的。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在重建和笼络西欧、德国与日本方面做得非常明智甚至是非常出色。在1947年春到1950年春之间的关键岁月里，他们非常明智地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经济重建而不是重整军备上。当时，他们正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即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就是要让资本主义更加有效地运作起来。他们还意识到赢得人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人们深受战争之害，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他们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进程的信心早已被他们的亲身经历击得粉碎。另一方面，这些明智的美国决策者们也会经常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夸大了苏联的力量和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将革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低估了冲突的地方性根源，并将第三世界外围地区看得过于重要。他们还夸大了意识形态联系的重要性，并且低估了众多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抱负的影响。他们曾考虑过制订一项分裂莫斯科和北京的楔子战略，但没有去执行。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还常常与名誉扫地且不得人心的上层统治阶层建立了联系。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会成为美国可靠的合作伙伴，但是这些人往往也有他们自己的议题要完成。

制订战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智者有时也会制定出愚蠢的政策，这不足为奇。由于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清楚斯大林的意图，而且又常常担心最坏情况的发生，因此他们对克里姆林宫所怀有的恐惧心理、苏联的历史经历、苏联人对德国入侵和西方包围的记忆都做了最小化处理。他们之所以在犯了错误而且缺乏同理心的情况下还能够达到目的，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优势力量。华盛顿在那几年里拥有的核垄断、核优势和战略空中能力使得美国政府的官员们能够冒得起风险。但是，这些官员们还是希望能够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实际上，他们在朝鲜战争期间之所以不愿意将战争扩至鸭绿江另一侧，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忧虑，即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激活中苏联盟并触发一场与苏联的全面战

争。总之，这些智者尽管有时也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非常谨慎的。

尽管美国的决策者们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取得胜利，担心其在德国西部、日本和朝鲜半岛南侧实施的占领政策因失败而产生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不那么在意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他们非常认真地权衡了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利弊，但最后还是断定中国问题属于一个不重要的优先事项。像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样的决策者们当时认为，中国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影响华盛顿与克里姆林宫之间不断发展演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而且它还有可能成为实际上消耗苏联资源的一个国家。当然，美国遏制政策的意图就是要阻止苏联的影响扩散到像联邦德国、西欧和日本这样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地区。如果遏制是成功的，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希望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能够逐步明白他们不会赢得冷战。但这要取决于美国证明民主资本主义优于苏联体制的能力，还有华盛顿的盟国在这方面的证明能力。

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从未想到，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就开始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令人刮目相看。随着作为全球性竞争对手的苏联烟消云散，美国的许多观察家们现在都在盘算着与中国进行一场冷战，甚至是一场热战。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们还就新兴大国挑战现有霸主地位时的战争前景问题进行了大量描述。那么有没有从美苏早期冷战中可以吸取的适用于当今世界的经验教训呢？另外，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类似于二战后克里姆林宫带来的挑战吗？

经验教训是存在的。首先，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当时苏联带来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在二战后民主资本主义极度混乱、前途极不确定的背景下盛行的那种意识形态竞争现在已不复存在。当时的苏联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曾一度）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今天的中国并不代表同样类型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国已经践行了许多新的做法，不仅抛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拥抱了国际市场，而且接受和吸收了消费文化。尽管有着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但是中国不会像克里姆林宫在冷战高潮时所做的那样，用一种彻底改变国际事务的传教士冲动来处理世界事务。

其次，当前也不存在同样类型的地缘政治竞争。今天的美国没有理由担心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会逐步落入敌视美国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阵营中去。美国在西欧和东北亚依然拥有强大的伙伴国。在冷战初期，美国的确有理由担心——尽管这种恐惧与威胁本身并不成比例——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中国和日本的国内形势可能会为苏联扩大其势力范围提供天赐良机。但是今天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了。虽然中国现在专注于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南海及周边地区，但这根本无法与冷战开始时苏联对美国决策者们所理解的本国利益构成的直接和间接威胁

当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需要认真思考那些塑造了对方对威胁和机会认知的记忆、文化意象(cultural tropes)和历史经验教训,还应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自身因感到国力增长而骄傲或因感到国力衰落而焦虑的心态。

相提并论。确切说,中国的举动类似于美国20世纪初期在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等地区的影响力投射行为。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英帝国非常巧妙地适应了美国实力的增长。因此,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今天需要进行类似的考量。懂得何时该遏制、何时该适应是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意愿取决于同理心。在冷战初期的那几年里,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很难理解对方的看法、焦虑和恐惧。双方都不看重历史记忆的重要性,这些历史记忆包括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纳粹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和占领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对当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而言,需要做的就是认真思考那些塑造了对方对威胁和机会认知的记忆、文化意象(cultural tropes)和历史经验教训。他们应当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自身因感到国力增长而骄傲或因感到国力衰落而焦虑的心态。

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还需要非常认真地权衡利益得失。冷战之所以一直维持冷状态,就是因为美苏领导人最后终于明白,他们可以共同生活在彼此的优先事项之中这一关键问题。华府的官员们,尤其是在冷战初期的那几年里,小心翼翼地选取了他们的优先事项,从而避免了在东欧与苏联的对抗,就像他们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避免了扩大战争范围一样。苏联人之所以尊重美国在西欧、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主导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被认为是对华盛顿至关重要的利益。如果这些利益受到了挑战,就可能会导致一场斯大林不想要的战争。所以,今天中美两国的政府官员们也都应当能够明白他们的优先事项——避免核对抗、控制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全球贸易、保护海上航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要比中国周边海域存在的摩擦根源更加重要,后者牵扯了他们大量的日常关注。战略就是对优先事项做出选择,明智的选择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将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与潜在对手进行调和,在努力追寻对全球公域的共同承诺的过程中,潜在对手有可能成为朋友或者盟国。

当然,对中美两国领导人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必须是要确保他们国内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生存能力。实际上,冷战就是一场如何组织政治经济和推动社会文化生活现代化的竞赛。西方之所以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或者高超的外交智慧——虽然这些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结果是二战后的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到的,因为当时全世界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自由资本主义不是停滞不前、萎靡不振、就是令人压抑,认为指令经济和国家计划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还是实现现代化的快车道。然而,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东京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重新校准了他们政府的能力,培育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福利、支持教育事业、

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同时努力维护他们之间的和平——这些目标超出了1945年大多数人的想象。总而言之，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让本国的体制更加有效地运行。我个人认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时刻牢记这一点：他们不应当被拖进大国竞争的陷阱之中，因为这将会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最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本国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

当今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当时刻牢记一点：不应当被拖进大国竞争的陷阱之中，因为这将会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最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本国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